

中国县域零工经济及劳动者现状研究

何晓斌 石一琦*

摘要: 近年来,零工经济(Gig Economy)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对各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零工经济已成为各国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回顾了过往研究对于零工经济发展背景、经济模式、用工模式的探讨,并以 58 同镇为例描述了中国县域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蓬勃发展、潜力巨大,已有大量中青年劳动者参与到零工经济之中,通过零工工作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零工经济为县域劳动者,尤其是低收入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提高劳动者收入、改善就业环境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但也存在劳动保障不完善、收益不稳定等问题。在发展县域零工经济的同时,应关注零工经济平台的制度规范和零工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以促使零工经济在中国县域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县域 零工经济 58 同镇

一 引言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传统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网

* 何晓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石一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络化、数字化为基础的互联网经济和共享平台的蓬勃发展正逐渐颠覆传统用工模式。依托互联网技术及共享经济的普及，“零工经济”这一全新的用工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并快速发展，逐渐成为现代雇佣经济的一个重要主题 (Taylor et al., 2017)。

零工经济 (Gig Economy) 指的是“由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 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 主要包括群体工作和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两种方式”。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在《零工经济: 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一书中将零工经济描述为“用时间短、灵活的工作形式, 取代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形式, 包括咨询顾问、承接协定、兼职工作、临时工作、自由职业、个体经营、副业, 以及通过自由职业平台找到的短工”。与传统的人才招聘方式和“企业-员工”这一雇佣模式相比, 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主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和平台获取就业信息, 以“临时合作”的方式代替传统企业中的长期劳动合同关系。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劳动力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 同时, 劳动者身份从“被雇佣”向“自我雇佣”的转变也使得劳动者对于工作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控制权 (金丹、刘婧, 2018; 杨滨伊、孟泉, 2020; Rozzi, 2018; 郑祁、杨伟国, 2019a、2019b)。区别于传统意义上低技能者迫于生存压力而进行的“打零工”, 零工经济既包括通过线上平台开展业务但在线下进行交付的工作, 如外卖配送、快递配送、货物运输等体力劳动, 也包括通过线上平台远程开展业务和交付的工作, 如专业性服务 (包括线上法律服务、咨询、金融审计等)、文书和数据录入、创意和多媒体服务、线上营销支持、软件和技术开发、写作与翻译等 (Huws et al., 2016; Lepanjuuri et al., 2018)。与传统的“打零工”相比, 零工经济更多地要求劳动者提供知识、技能、经验等无形产品, 并向用户展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换言之, 零工经济更加强调劳动者利用自己的资源、特长实现自身的价值, 而非单一地出卖劳动力以获得生存资源 (金丹、刘婧, 2018)。在线叫车平台 Uber、Lyft、滴滴, 外卖平台美团, 租房平台 Airbnb 和微型工作平台 Amazon Mechanical Turk、Clicworker 等是零工经济的典型代表 (谢富胜、吴

越, 2019; Stefano, 2016)。

目前, 零工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通过零工经济获取报酬。2016年麦肯锡对6个国家8000名法定工作者的调查发现, 欧洲和美国约有20%~30%的劳动者为自由职业者, 欧美自由职业者总人数已达1.62亿。Lepanjuuri等(2018)对英国的研究发现, 2017年有4.4%的英国成人参与了零工经济, 约2.4%的成人至少每月从事一次零工经济活动。根据我国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 2017年, 我国零工经济平台企业员工约716万人, 比上年增加131万人, 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9.7%。有研究预计, 2035年中国将约有4亿人参与到零工经济之中(秦艺瑗, 2018)。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零工经济正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对全球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的发展起着日渐深远的影响。

二 文献综述

零工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其对于各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 引起了政府、学界和企业等利益相关群体的广泛关注。目前, 学界主要从发展背景、经济模式、用工模式等维度对零工经济进行了研究(郑祁、杨伟国, 2019a、2019b)。

(一) 零工经济的发展背景

零工经济的概念早已有之。早在20世纪70年代,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标准雇佣关系的逐渐解体和“弹性企业”的兴起, 临时工作者和边缘劳动者开始大量出现。1995年, 美国临时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9%, 选择非正规就业关系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9.8%(谢富胜、吴越, 2019)。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信息传播的广度、速度和效率有了革命性的提高, 来自世界各地的供需方能够通过互联网在线平台聚集在一起, 市场中的

信息成本和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同时,由于知识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劳动模块化分包形式的出现,有相关技能的劳动者能以更加自由灵活的形式参与到生产活动之中。在此背景下,企业工作外包的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企业的边界进一步收缩,企业“弹性”扩大。有学者认为,零工经济“就是在数字平台推动的新一轮标准化和模块化过程促进下,利用数字技术的杠杆将数量弹性发挥到新高度的经济形式,是数字时代包买商和计件工资制度的再现”(谢富胜、吴越,2019)。

除了“弹性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部分劳动者对于灵活就业的追求,经济衰退带来的负面就业冲击也是催生零工经济的重要因素。麦肯锡在一项关于零工经济调研的报告中发现,当前零工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四种类型:一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独立自主地选择工作并将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二是赚外快者,他们主要利用碎片化时间从事零工工作以获得额外收入;三是不情愿者,他们主要依靠零工工作获得收入,但仍向往稳定的工作;四是经济困难者,这部分劳动者与以往的打零工者类似。在所有零工劳动者中,仅第一类劳动者(约15%)依靠数字平台赚钱,约30%的劳动者被迫成为零工。麦肯锡分析师马尼卡发现,在西班牙和希腊等高失业率国家,零工经济往往更加发达,因此他认为糟糕的就业市场和经济衰退是当前零工经济快速盛行的主要原因。Katz和Krueger(2019)的一项对于零工参与者的研究也发现,相比于自由职业者和独立承包商,多数参与兼职的工人是工资收入较低者。可以认为,失业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参与零工工作的劳动者数量的增加。

除经济和技术因素外,人口结构改变和社会心理因素同样推动着零工经济的发展。随着各国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成本增加、专业技术人员不足已成为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零工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同时为有家庭负担的劳动者提供更加多元的工作选择。此外,相比于老一辈的劳动者,青年劳动者的成长环境更加自由宽松,他们较早地接触互联网和海量网络信息,掌握了相对多元化的技能,也更加强调自由与独立,对于传统科层制有较强的批判意识,愿意选择更加自由的方式进行工作。这些因素都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加入到零工经济之中。

（二）零工经济的经济模式

对于零工经济的具体经济模式，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零工经济的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零工经济主要依靠互联网和在线平台进行各类工作信息的汇总、挖掘和计算，工作内容和过程受到数字化监管，零工经济的劳动者能够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突破了以往企业组织的限制。有人曾提出，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具灵活性和自主性的零工经济将使传统工作走向终结（杨滨伊、孟泉，2020；Stanford，2017）。此外，零工经济的经济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的临时工作也有着根本性差别。得益于数字平台的高效率匹配和算法管理，零工经济打破了过去临工劳动者依靠人际网络获取工作、规模有限、组织松散的特点。借助数字平台的大规模供求信息即时匹配和高效组织，众多劳动者作为“独立承包商”，在数字平台的中介和组织下自主提供按需工作，零工经济因此成为一种“大规模、高度组织化的经济形式”（谢富胜、吴越，2019）。

与上述观点相反，另一派学者认为，零工现象早已有之，零工经济是历史的回归而非传统的终结（Gleim et al.，2019）。Stanford（2017）对于现代零工经济平台的研究指出，现代数字平台的五项组织特征（按需工作，计件报酬，生产者自带资本和设备，工作组织者是中间人而非终端消费者，数字中介被用于分配、监督工作）中，除了现代数字技术的应用，其他所有特征在资本主义早期均有所体现。临时性、季节性的契约劳动一度是资本主义早期有偿工作的主流形式，而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外包、分包的策略也始终存在于各行各业之中。将早期行会体制的小规模制造向分包制的演变，与出租车队到Uber的扩张进行对比，可以发现Uber式的现代数字平台不过是金融资本参与下披着现代数字技术外衣的分包制。零工经济的出现并非技术决定的结果，而是雇主为回应经济社会变迁而改变劳动力攫取方式的结果。Gupta等（2014）同样提出，零工经济只是过去非正式用工形式的一种延伸，互联网的使用扩展了非正式用工的范围，但未改变其实质形式。零

工经济并非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而是失业率增长的表现（Friedman, 2014; Aloisi, 2016）。

不管是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还是作为传统经济模式的延伸，借助互联网的发展，零工经济正快速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模式。

（三）零工经济的用工模式

灵活自由的工作模式是零工经济最为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依托互联网和数字平台，零工经济打破了劳动力市场在时空上的限制，降低了市场的准入门槛，允许更多劳动者（特别是低技能者和失业者）以更加便捷的方式参与到生产活动之中（Li et al., 2018）。其次，因专业领域细分、工作内容碎片化而大量出现的零工经济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众包平台等零工经济平台为劳动者提供了众多跨行业的模块化工作，只要符合任务要求，不同领域的劳动者均能参与到任务之中（谢富胜、吴越，2019）。此外，零工经济还赋予了劳动者更多的自主性。通过数字平台，劳动者可以自主选择接受或是拒绝工作任务，并根据个人的技能、经济需求、空余时间等因素调整工作状态，主动把握工作过程（秦艺瑗，2018）。

零工经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不只体现在参与零工经济的劳动者上，也体现在参与零工经济的企业组织上。通过劳动模块化外包的形式，企业得以寻求较为低价的劳动力。同时，将专业化产品外包，有助于降低企业对于专业化人才的需求，极大地缩减人力成本。此外，零工经济平台通常要求劳动者承认自己“独立承包商”的身份，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规避雇主的法定责任（如最低工资、加班费、各类保险等法定福利），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风险（谢富胜、吴越，2019；杨滨伊、孟泉，2020）。正如 Amazon Mechanical Turk 的官方宣传语所言，在线众包平台使得个人和企业可以在“全球性、全天候的按需劳动力市场”中采购，以“优化效率、提高流动性并降低成本”^①。

^① 参见 Amazon Mechanical Turk 官方网站: <https://www.mturk.com>。

当然，零工经济的灵活性在给劳动者和企业带来多样化选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隐患。脱离了传统的雇佣模式，零工经济劳动者将面临更大的经济风险和不稳定性。零工经济平台通常要求劳动者以“独立承包商”的身份进行工作，这使得处于被动地位、议价能力低的劳动者无法获得传统雇佣关系中法律保护的基本权益和福利保障，低技能劳动者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杨滨伊、孟泉，2020）。此外，互联网匹配工作信息的方式使灵活的工作时间成为可能，但这也导致更严重的劳动力商品化问题。零工工作获取方式的便捷性使得高技能劳动者能够利用空闲时间参与零工经济获取额外收入，而高技能劳动者的进入在满足专业性零工就业市场需求的同时挤占了部分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市场。在此背景下，少数高技能劳动者能够在零工工作中获益，而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不得不进行激烈的竞争，在此过程中低技能劳动者被进一步商品化（Stefano，2016；Farrell and Greig，2016）。最后，零工经济平台通过算法自动管理与用户评分机制进一步控制零工劳动者。在平台算法和用户评分的监督和激励下，劳动者自我控制能力不断强化，通过持续努力以获得较高的评分，劳动者在此过程中不断异化（吴清军、李贞，2018）。对于企业而言，尽管劳动外包可以降低企业人力成本，然而产品过度外包也可能导致组织内部人力资本流失和管理失效（Ashford et al.，2018）。同时，工作任务模块化和碎片化也使得传统企业组织的管理模式逐渐失效，企业内部团队协作机制将面临巨大挑战（Byrne and Pecchenino，2019）。

综上所述，零工经济是数字技术、社会经济状况、人口结构和社会心理因素共同变化导致的结果。零工经济的灵活性和选择多样性在给劳动者和企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双方带来了风险，应辩证看待零工经济的影响。

三 中国零工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零工经济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8年以前，以“猪八戒网”等为代表的基于互动式问答的知识分享网站和众包平台开始出现，

我国围绕知识和零工的共享经济正式萌芽。2009年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互联网+零工经济”为核心的滴滴、美团等共享经济型企业大量出现,在教育、经济、快递、家政等各个行业全面开花(李珊,2019)。与此同时,一些传统企业也开始开展零工业务,如宝马、奔驰等企业开展以租代售业务;海尔集团提出“人人创客”的发展战略,鼓励个人在平台上提出创业思路;用友集团为中小微企业搭建了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等。这一时期,我国零工经济迅猛发展。

《2016滴滴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显示,2016年滴滴平台共创造了1750.9万个灵活就业和收入的机会,其中14%的网约车司机为去产能行业的工人,5%的网约车司机为退伍/转业军人。在滴滴平台上,有207.2万名网约车司机日收入超过160元,网约车业务为越来越多的司机提供了经济来源。2018年2月,《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显示,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约有716万人,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9.7%。阿里研究院预测,2036年中国将有4亿人成为自由职业者,约有1/2的劳动力将以零工的形式提供生产和服务。以上数据均表明,零工经济正在我国各个领域快速崛起,并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国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也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鼓励进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7年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共享经济带动就业创业被纳入“十三五”工作任务中,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将大力支持发展共享经济下的新型就业模式。201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湖南衡阳、长沙考察。针对当前就业市场供求特点,李克强提出要大力发展“互联网+民生”,积极培育和引导分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健康发展,既大量拓展就业岗位,又满足多样化消费升级需求。作为新时期推动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零工经济正成为国家关注的重要经济模式。

四 中国县域零工经济及劳动者现状: 以 58 同镇为例

在城市中,以网约车、外卖等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行业逐渐成为零工经济的主流,此类行业也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随着各类互联网平台的扩张,这一趋势逐渐渗透到下沉市场,给当地的就业方式带来新意,并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跟进。职业社交平台 LinkedIn 在 2015 年进行的一项关于自由零工的调查显示,中国约 74% 的自由职业者分布在中小城镇,零工经济已成为提高乡镇就业率、改善乡镇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方式之一。58 同镇是 58 同城旗下乡镇生活信息服务平台。利用线上 App 和微信,具有创业精神和本地号召力的 58 同镇站长(目前已经招募了约 1.6 万名)积极收集本地便民信息,并为 58 同镇用户提供招聘、房产、本地推广、车辆买卖等信息服务,构建起以乡镇居民为对象的本地化社交新网络。目前,58 同镇已成为中国县域重要的零工经济平台之一。为进一步全面了解县域零工经济发展现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与 58 同镇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5 日联合开展了一次有关县域零工经济现状和问题的调查研究。本次调研利用 58 同镇线上平台在全国县域乡镇地区随机发放调查问卷,最后收回 16833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16485 份,问卷有效率为 97.93%。

(一) 县域劳动者发展现状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县域劳动者存在工作流动性大、就业稳定性低的特点。在接受调查的 1.6 万多名受访者中,约有 24.97% 的劳动者为自由职业者,在所有职业中占比最高;拥有稳定职业的群体(在私企、事业单位、国企、集体经济组织拥有职务的人群及公务员)仅占 38.91% (见图 1)。可见,县域地区超过六成人以相对不稳定的工作为主,人员工作流动性较大,尚未达到相对饱和的就业状态,灵活就业的劳动力较多。

目前,零工经济已成为县域地区的重要经济模式。根据调查结果,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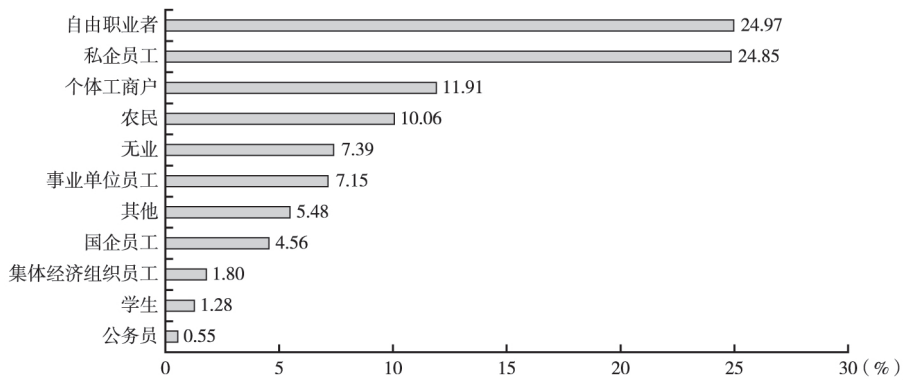


图1 县域劳动者职业分布

52.27%的县域劳动者拥有零工工作，其中，27.56%的劳动者将零工工作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24.71%的劳动者同时拥有主业收入和零工收入（见图2）。在没有零工工作的群体中，超过90%的人愿意从事一份零工工作以获得收入，大部分人从事零工工作的主观意愿较为强烈。这充分说明我国县域零工基础较好，能够参与灵活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众多，零工经济在我国县域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现阶段，零工工作已成为我国乡镇群体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对于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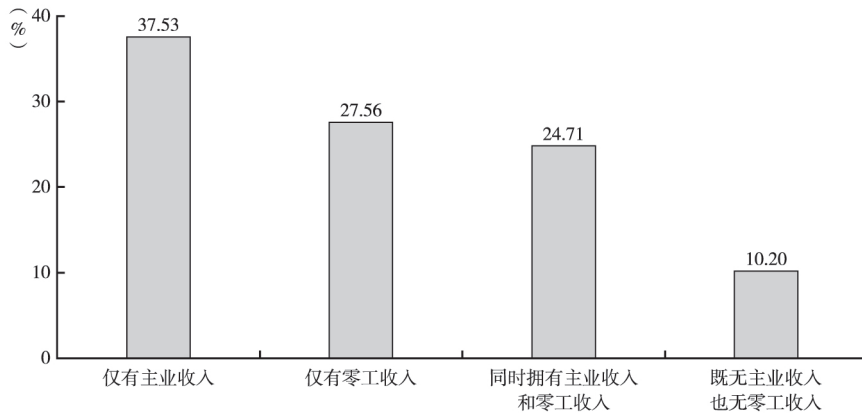


图2 县域劳动者收入来源构成

现阶段，主业工作仍是县域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但零工工作正逐渐成为县域劳动者的重要经济来源。通过比较仅有主业收入和仅有零工收入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58 同镇的调查数据显示，仅有主业收入的人群的月收入均值和中位数均较高，47.45% 的仅有主业收入的人群的月收入为 2000 ~ 4000 元。与之相比，仅有零工收入的人群的月收入明显偏向低值，超过 49% 的劳动者月收入仅为 1000 ~ 3000 元。值得注意的是，在月收入超过 3000 元的人群中，有 37.29% 的人完全依靠零工收入，而 68.22% 的人依靠主业收入；在月收入低于 3000 元的人群中，仅有零工收入的人群的比例明显高于仅有主业收入的人群（见图 3）。也就是说，在县域地区，就业越稳定，月收入也普遍越高。既有主业收入又有零工收入的人群，占总人数的 24.71%，分析收入构成可看出，有 57.26% 的人群主业收入在 2000 ~ 5000 元之间，有 64.83% 的人群零工收入在 2000 元以下（见图 4），总收入高于仅有主业收入或者仅有零工收入人群。整体来看，这部分人群的主业收入与零工收入占比约为 2:1，是县域市场绝对的高收入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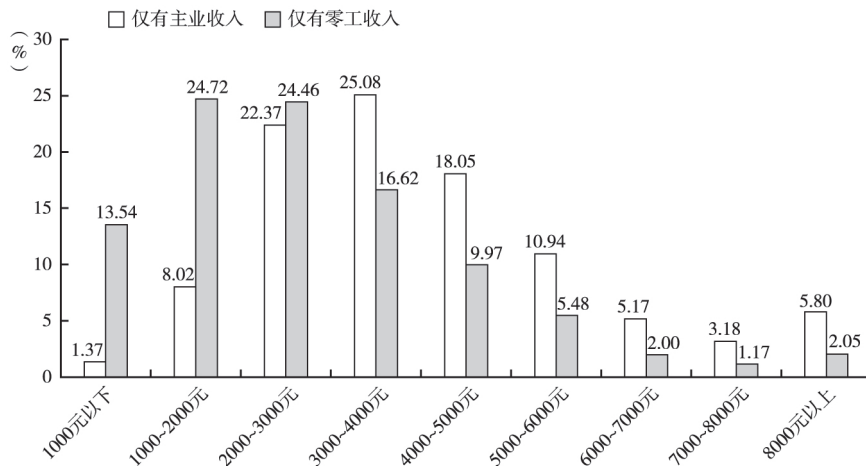


图3 仅有主业收入和仅有零工收入人群月收入对比

在问及零工月收入预期时，受访者的零工月收入期望普遍在合理范围内，其中 71.18% 的人群希望每月有 1000 ~ 4000 元的零工收入。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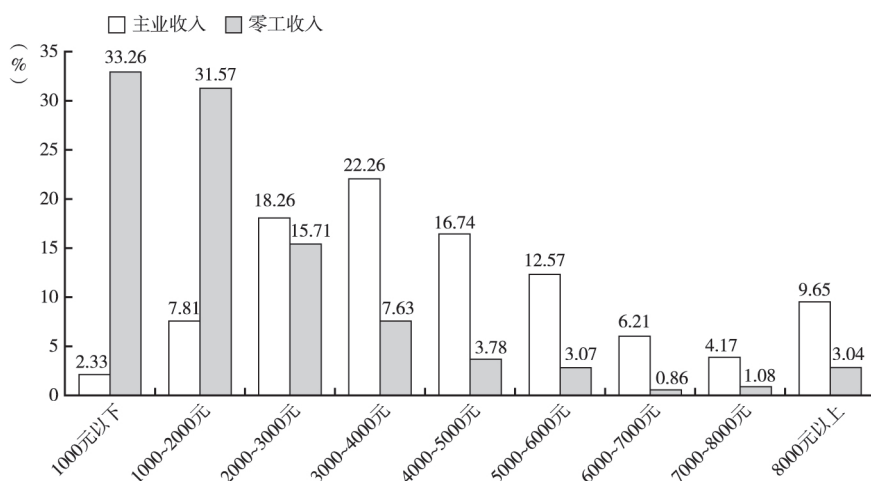


图4 同时拥有主业收入和零工收入的人群的主业、零工月收入对比

2000 ~ 3000 元零工月收入的人群占比最高（见图 5），值得一提的是，仅有主业收入的受访者中有 1/5 的人拥有同样水平的收入，这意味着零工在一些重点领域已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就业形式，至少是一种重要的收入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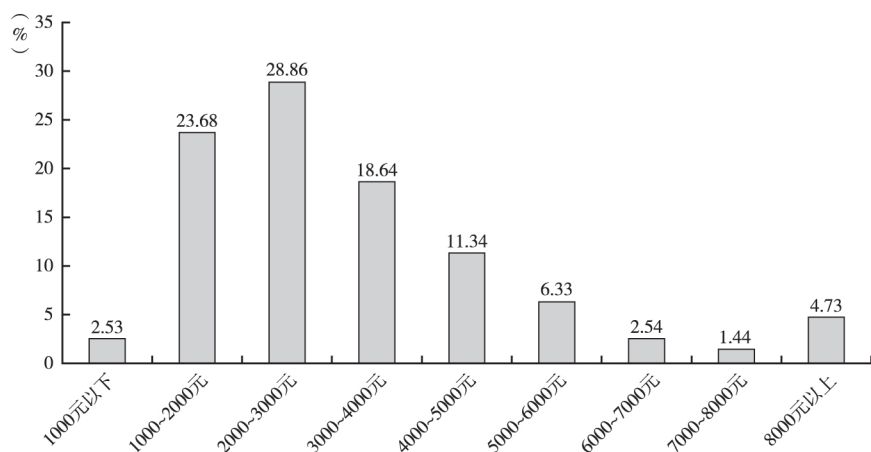


图5 零工人群期望月收入

相较于传统朝九晚五的工作形式，零工经济凭借工作时间灵活、工作报酬可观、工作强度适中独特的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县域劳动者从事零工工作（见图6）。58同镇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由于兴趣匹配或工作乐趣，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表示享受零工劳动的过程，这可能是由于零工经济为人们带来了更多选择，为用户提供了更多从事力所能及且感兴趣工作的机会，使得就业者的工作兴趣和岗位能够更好地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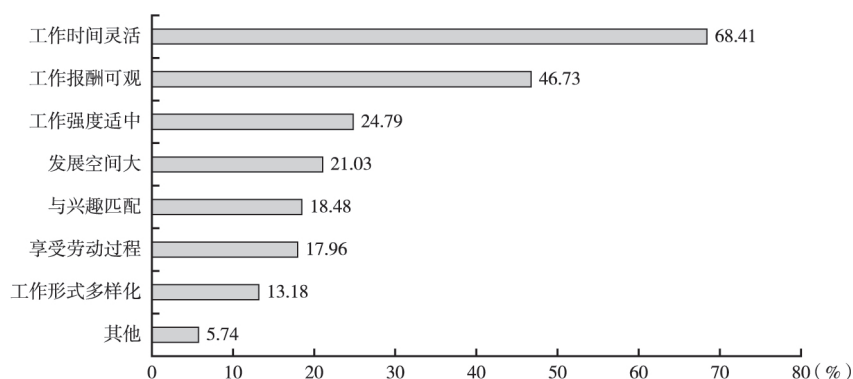


图6 吸引劳动者从事零工工作的因素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县域地区自由劳动力较多，人员工作流动性较大，县域零工基础较好，零工经济在我国县域具有极为广阔的市场。现阶段，零工工作已成为我国县域地区劳动者重要的就业方式和收入来源。发展零工经济对于提高县域地区就业率、提升县域劳动者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县域零工群体画像

将人群进行细分后，58同镇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灵活自由的零工经济对于县域中的女性更具吸引力，女性零工占从事零工工作总人数的52.22%（见图7）。在仅拥有零工工作的群体中，女性零工占比（55.82%）同样高于男性（44.18%）。县域地区女性群体获得一份全职工作相对更困难，有很大部分群体由于生育、家庭等原因放弃工作，导致县域地区存在大

量全职家庭主妇、宝妈。相当多的县域女性劳动者（74.90%）渴望获得一份工作时间灵活的线上零工工作（见图9）。这说明在县域市场中，零工经济对于女性有重要的意义，县域女性参与零工工作的潜力巨大。得益于互联网和零工经济的发展，女性拥有更多机会获得零工工作，零工经济对于提高县域女性经济收入、改善县域女性生活状况具有积极作用。女性零工或将成为未来县域零工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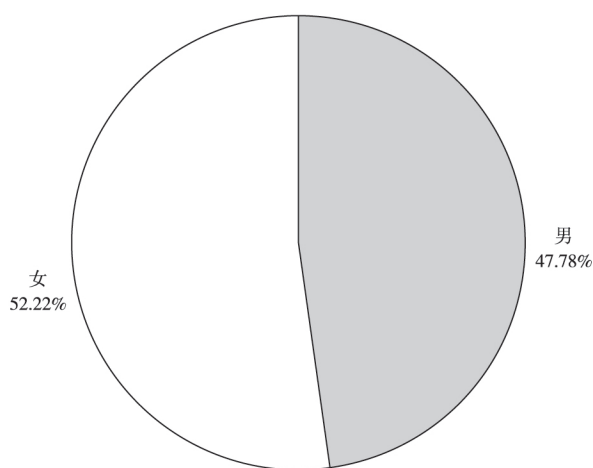


图7 县域零工群体性别比例

从年龄结构来看，中青年群体是从事县域零工工作的主体。58同镇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县域市场中的零工从业群体中，超过90%的零工从业者为21~50岁的中青年，其中31~40岁的青年人占比达38.57%（见图10）。这可能是因为青年人接触的新事物较多，对零工工作的接受度更高。同时，青年群体大多具备一定的互联网知识，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零工工作。此外，中青年群体也是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因此成为县域零工经济中的主要从业者。

将县域劳动者按年龄细分为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三个群体，分别对应当前用工市场的青年、中年、中老年三个阶段，我们发现不同年龄用户对于零工工作的偏好有如下特点：30岁以下的青年用工群体，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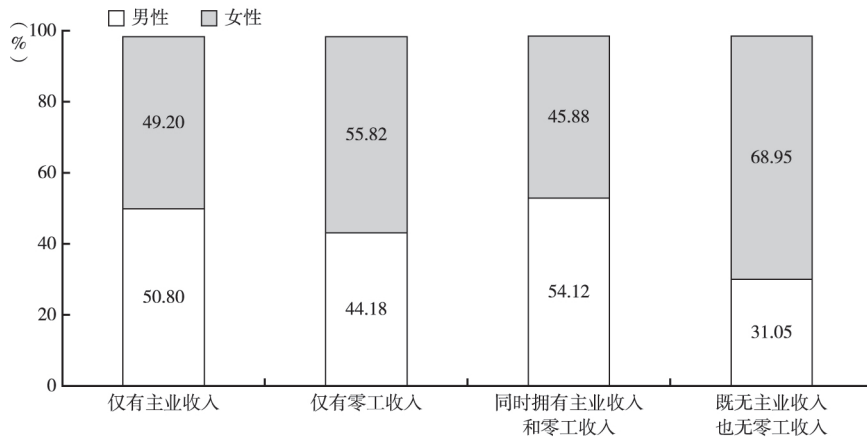


图8 县域劳动者性别与收入来源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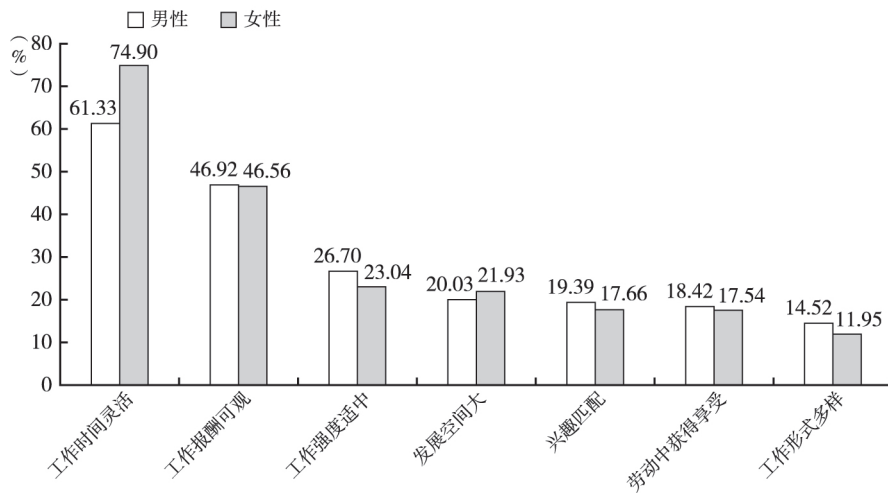


图9 性别与零工吸引力

处于职业发展的探索期和定位期，普遍更关注零工的工作报酬、发展空间等因素。30~50岁的中年用工群体，通常已经成家立业，职业发展进入稳定期，普遍对于零工的工作时间更加关注。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用工群体中，对于知识技能型劳动者来说，其职业已进入收获期，更加关注零工的兴趣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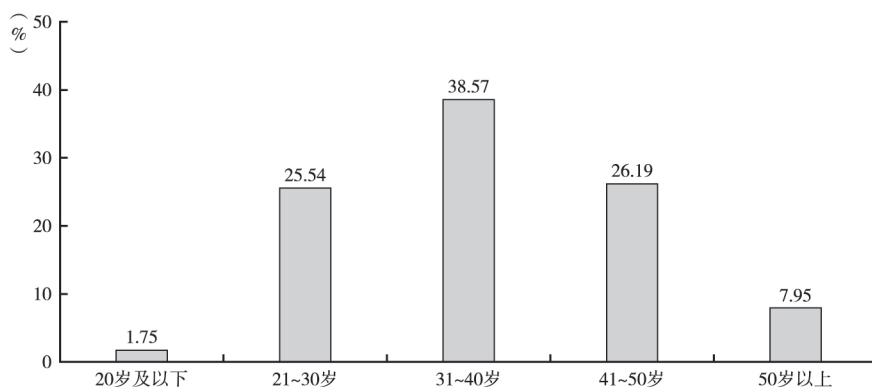


图 10 县域零工群体年龄分布

配、劳动中获得享受等精神层面；而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这个阶段其身体状况逐渐走下坡路，普遍更关注工作强度层面。零工吸引力对于不同年龄段用工群体的影响呈现梯次化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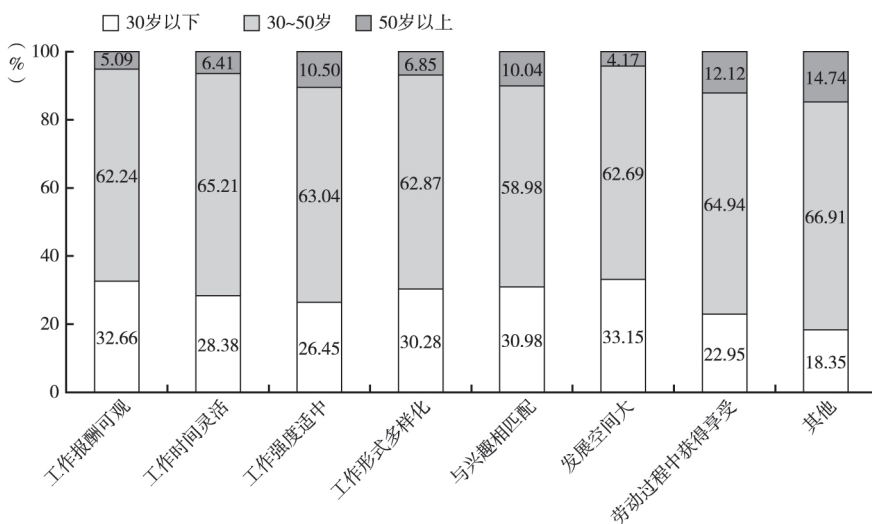


图 11 年龄与零工偏好

从学历和职业角度来看，当前县域零工仍然以低技能零工为主。在有零工工作的群体中，超过 70% 的群体学历仅在高中/中专及以下。在无零工收

入和主业收入人群中，小学及以下学历比例高达 28.69%，这部分群体以无业和务农为主，拥有较为强烈的零工需求。随着学历的提高，仅有主业和同时拥有主业、零工工作的群体比例快速上升，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性快速增长。可见，在县域市场中，零工经济对于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率、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高学历的劳动者而言，零工经济能够帮助其获得额外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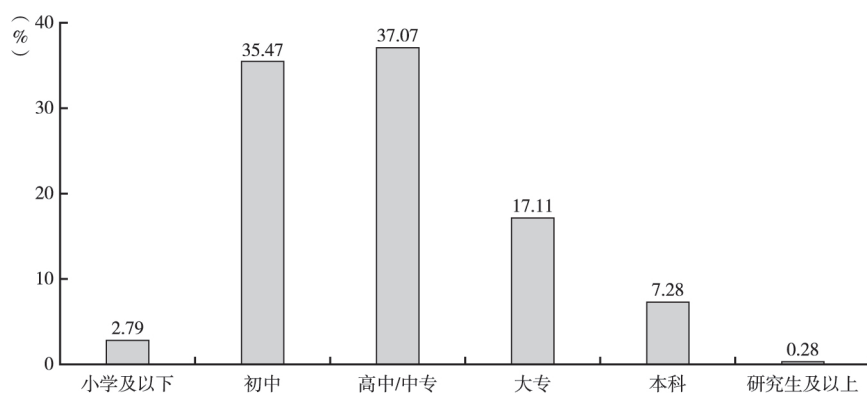


图 12 县域零工群体学历分布

结合学历、个体职业与零工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县域市场中，零工经济给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均带来了经济收益。对于低技能劳动者而言，零工经济是其主要经济来源，然而低技能劳动者通过零工工作获得的总体收益较少，并不能满足其期望。对于高技能劳动者而言，零工经济能为其提供额外收益，并非其主要经济来源。但多数高技能劳动者在零工市场中的收入高于低技能劳动者，这表明高技能劳动者在零工经济中的获益较低技能劳动者更多，不同技能劳动者的零工收入差异较大。

(三) 互联网：县域零工发展的新动力

随着互联网在乡镇的普及，互联网逐渐成为县域零工发展的新动力。58 同镇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有大量县域劳动者从事与互联网相关的零工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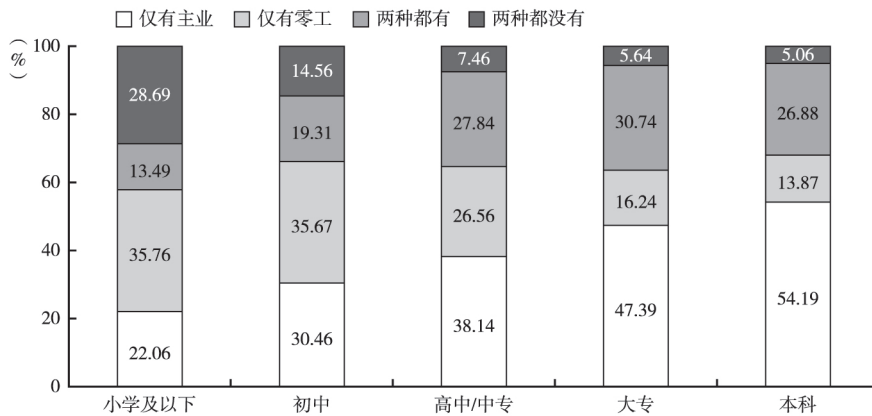


图 13 学历与收入来源构成

作。在县域人群中，有 35.11% 的县域零工劳动者目前从事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网店主、网络销售员、主播等互联网相关工作（见图 14）。在零工工作偏好上，40.25% 的劳动者偏好进行纯线上零工工作，互联网兼职（41.60%）、网店相关（29.43%）、司机（25.31%）是下沉市场用户希望出现更多的前三个职位（见图 15），用户对于互联网类零工的热情不可忽略。这表明县域市场零工从业者普遍对互联网持开放态度，互联网已经深深渗透到了县域市场的用工领域，在县域零工工作中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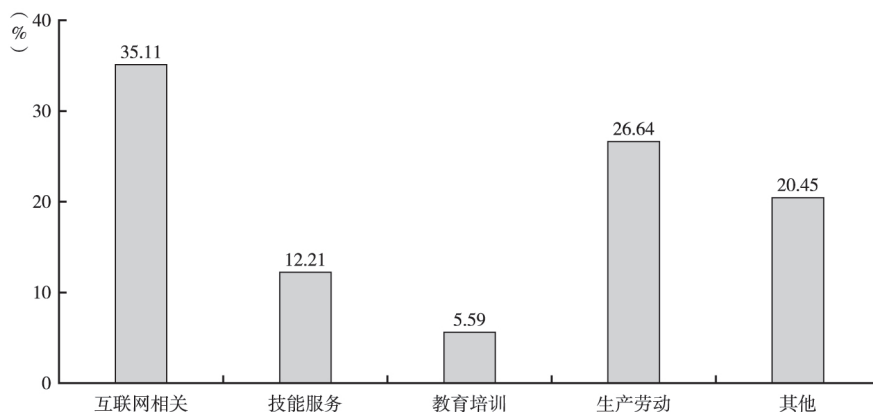


图 14 从事零工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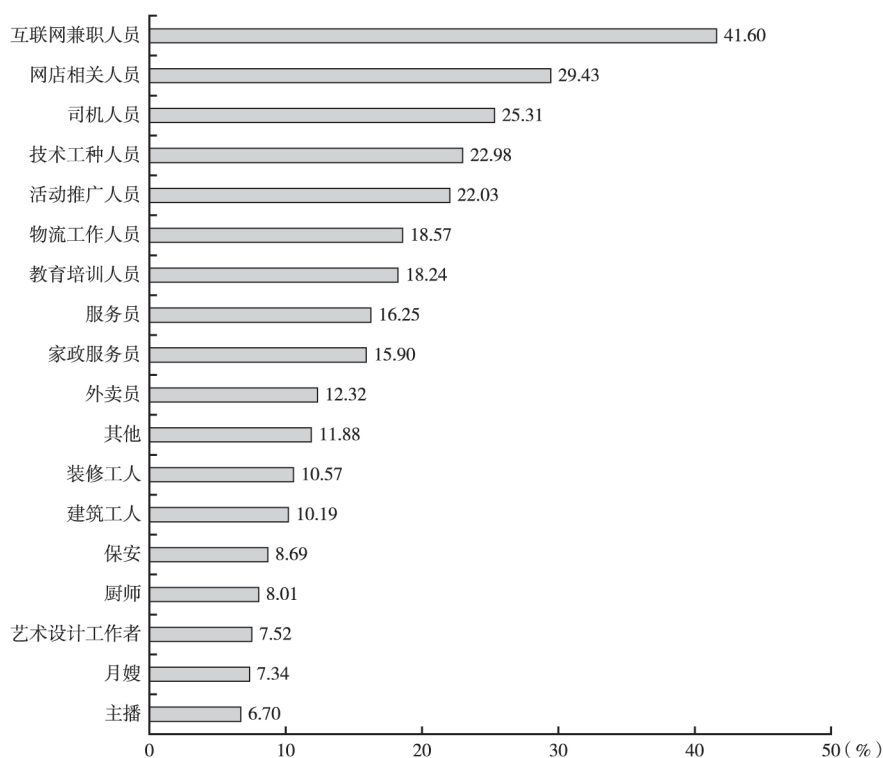


图 15 零工职位偏好

当问及人们认为自己有哪些从事零工的优势时, 38.43% 的人认为“吃苦耐劳品质”是他们最重要的优势, 而 32.74% 的人认为他们的互联网应用能力为他们提供了从事零工的优势 (见图 16)。互联网应用能力已成为目前县域零工劳动者寻找和开展零工工作的重要能力。以体力劳动为代表的传统零工遇上了现代互联网, 劳动的价值能够被更客观和精准的评估。

除了直接的互联网兼职, 越来越多的县域劳动者认识到互联网在提供零工工作信息中的重要性。问卷调查显示, 49.93% 的县域劳动者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零工工作信息, 其比例高于传统熟人社会中通过亲戚熟人介绍获取工作信息 (见图 17)。互联网在县域的渗透使得县域劳动者更易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有效促进了县域劳动者的就业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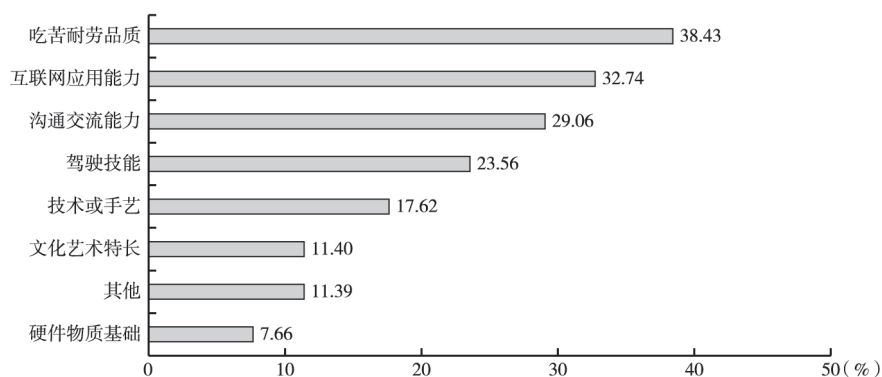


图 16 个人从事零工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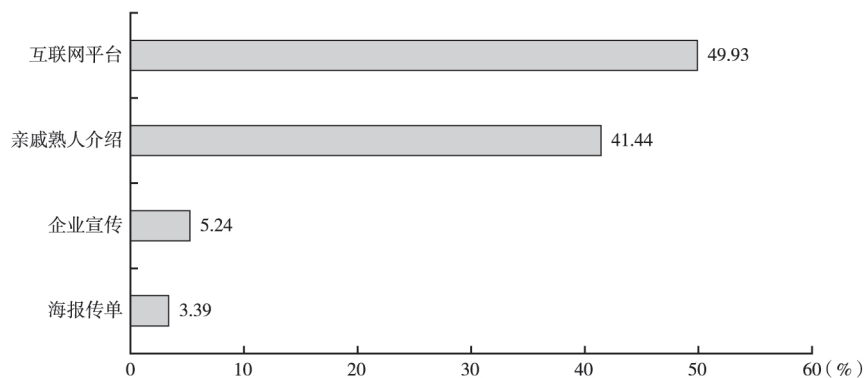


图 17 用户了解零工信息途径

在问及互联网平台对于目前用户寻找零工的作用时，超过半数受访者都给出了 5 分的满分评价。认为互联网对于零工行业的供需匹配是很有帮助的，该问题的平均得分为 4.34 分，互联网平台为县域用户提供了充分的平等就业机会，用户对于互联网平台满意度较高。

不同零工信息来源人群对于零工工作的满意度评分分别为：互联网平台（4.43 分）> 企业宣传（4.39 分）> 亲戚熟人介绍（4.24 分）> 海报传单（4.21 分）。与其他渠道获得零工信息的群体相比，从互联网平台处获得零工信息的群体对零工工作的满意度普遍更高（见图 19）。此外，与其他渠道获得零工信息的群体相比，从互联网平台处获得零工信息的群体月收入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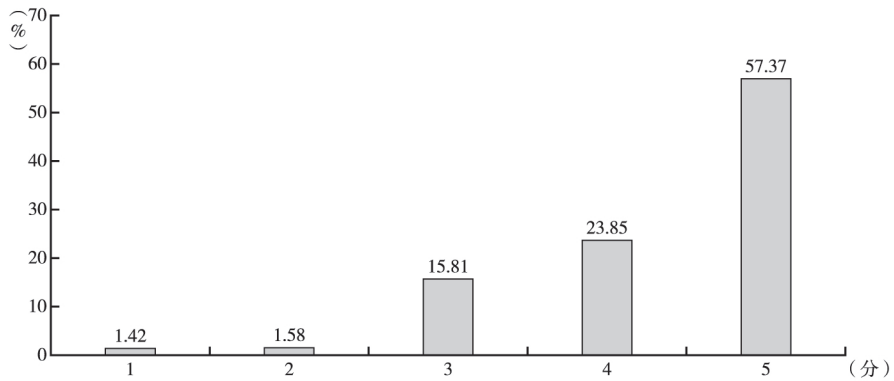


图 18 互联网平台对于零工的帮助

(见图 20)。这说明，在当前县域零工经济中，通过互联网发布的零工工作质量更高，能为劳动者带来更大的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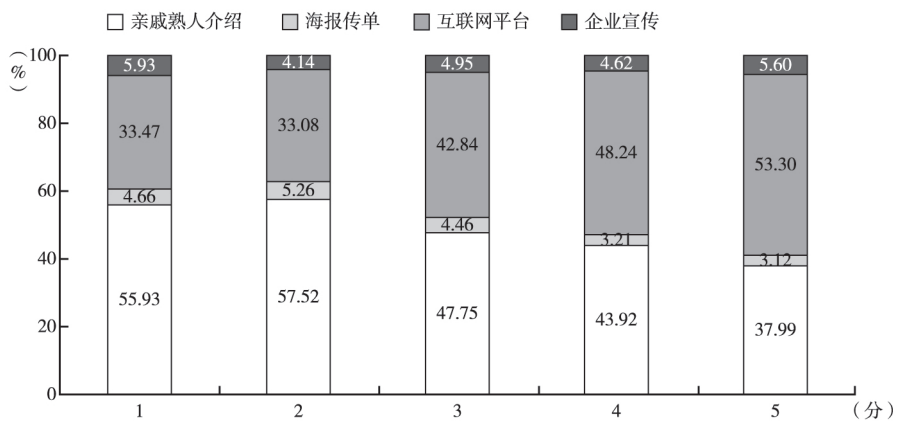


图 19 零工信息来源与互联网平台满意度评分

以上分析说明，互联网在当前的县域零工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互联网在县域地区的渗透，互联网平台在提供优质零工信息、为县域劳动者提供平等就业机会上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凸显。互联网应用技能将成为新时期县域劳动者获得零工工作的重要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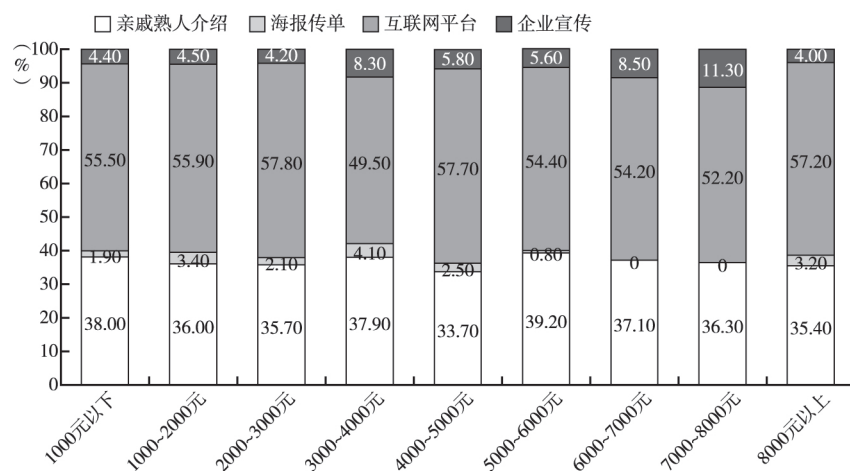


图 20 信息来源与零工月收入 (拥有主业与零工的群体)

(四) 县域零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由于当前县域零工经济发展仍在起步阶段,加之零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目前县域零工市场仍存在一定的问題。在满分为5分的情况下,用户对于当前零工市场现状整体评分为3.36分(见表1),低于当前用户对于互联网平台的满意度,可见整体零工市场还不够完善,用户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用户对各方面的满意度排名情况如下:工作环境(3.64分) > 工作强度(3.52分) > 劳动报酬(3.32分) > 社会保障(2.96分)。由于零工工作的不稳定性,用户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满意度低于其他的维度。

表 1 用户对于当前零工市场现状的评分

单位: %, 分

题目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不清楚	平均分
工作环境	4.45	4.18	36.04	26.78	23.54	5.02	3.64
工作强度	4.67	7.79	36.09	26.80	20.18	4.46	3.52
劳动报酬	5.98	11.30	41.27	21.86	15.98	3.62	3.32
社会保障	16.49	15.37	31.70	15.32	14.47	6.64	2.96
小计	7.90	9.66	36.28	22.69	18.54	4.94	3.36

按照不同学历人群来看，学历越高的人，对于零工市场环境、工作强度、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各项的满意度越高，整体的评分也越高（见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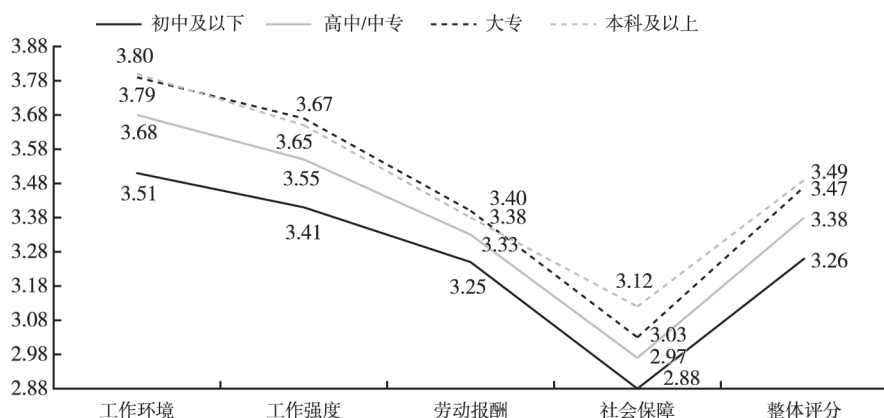


图 21 学历与零工市场满意度评分

从不同收入来源人群来看，可以发现人们整体对于零工市场的满意度的排名是：两者都有 > 仅有主业 > 仅有零工 > 两者都没有，这个排名恰好与前面调研发现的月收入排名一致，收入水平会正面影响人们对于用工情况的满意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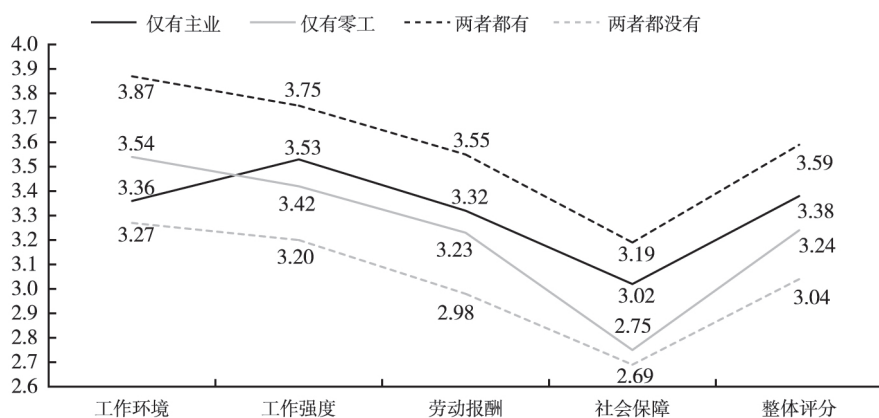


图 22 收入来源与零工市场满意度评分

尽管受访者对于互联网平台为零工信息提供的帮助给出了较高的评价，但仍然希望提供零工信息的互联网平台能够加强行业自律，优化信息服务；在源头上严格把关，强化全流程监管；在工作岗位数量、企业信息真实度、优质企业数量等方面有更多的改进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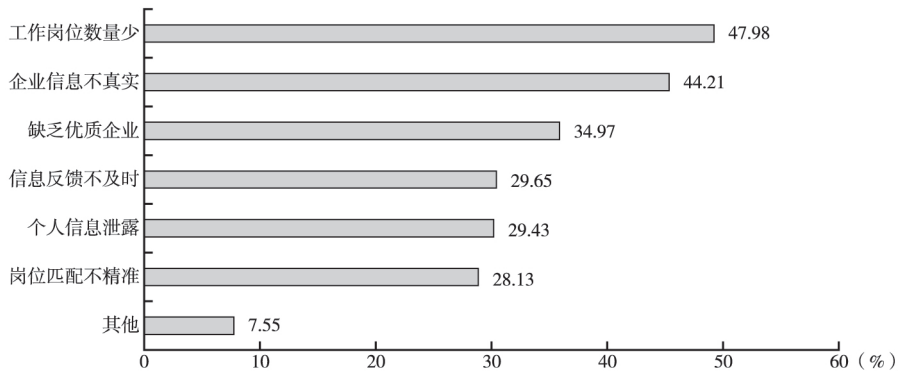


图 23 互联网零工市场不足

县域市场用户的反映的当前零工市场现状诸多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劳动关系得不到保障、收益不稳定、福利待遇不足。他们迫切希望行业平台和用工企业在这些层面加以改善。在问及受访者对当前零工市场有何建议时，他们的答案主要集中在提供更多种类、保证信息真实、工作时间自由、期望工资准时、增强劳动保障等方面，这也凸显了在零工市场的产品开发、服务保障、监督管理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总体而言，2019 年我国县域零工市场繁荣发展，大量县域劳动者或多或少地参与到零工经济之中，并通过零工工作获得了经济收益。互联网在县域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加快推动了零工经济的扩散，使得更多群体（特别是女性劳动者）能有机会参与零工经济。然而，目前县域零工市场仍存在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收益差异大、劳动保障不完善、就业岗位不充分等问题，县域零工市场未能与劳动者需求较好地匹配。应不断通过经济、法律手段完善县域零工市场，以进一步提高县域劳动者收入、改善县域就业环境、促进县域就业公平，使得零工经济更好地促进我国县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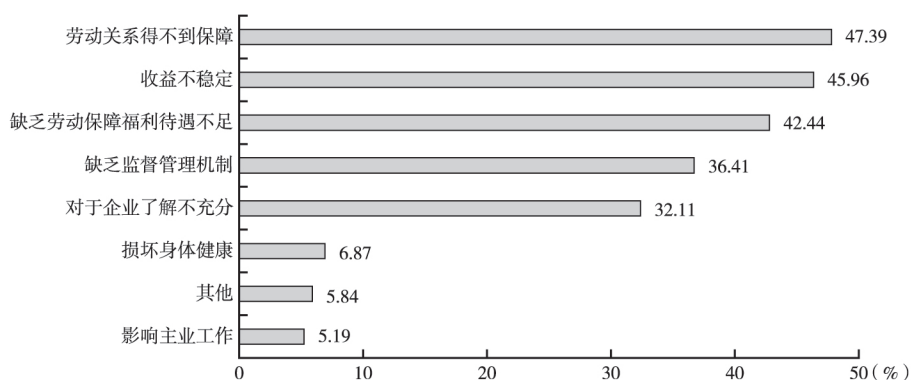


图 24 当前零工现状的不足

五 总结与反思

依托互联网和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零工经济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张，对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用工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借助互联网，零工经济突破了传统经济模式在时空上的限制，降低了市场信息传递的成本，为更多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而零工经济灵活自由的特点也使劳动者挣脱了企业组织的束缚、拥有更为多元的就业选择。然而，零工经济为劳动者和企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普遍存在劳工保障缺失、旧有企业管理模式失效的问题，这给企业、劳动者以及政府带来了挑战。

近年来，我国零工经济快速崛起，乡镇成为零工经济发展的重要场域。58 同镇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零工经济已成为乡镇劳动者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零工经济不仅为低技能劳动者、家庭妇女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了高技能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在现阶段，我国县域零工经济仍存在劳动者技能水平较低、不同技能劳动者收入差异较大、劳动保障不完善的问题。大力发展县域零工经济，促进零工经济在提高乡镇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县域劳动者就业率等方面发挥作用，需要充分发挥劳动者、零工企业和政府的能动性。首先，劳动者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以在零工市场中

获得更强的竞争力，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其次，企业要平衡劳动外包和企业核心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避免过度外包陷入组织发展困境。最后，政府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劳动者和企业在新经济模式下的合法权益。多方协调，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共同促进我国县域零工经济健康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下沉，零工经济必然会在县域经济活动中承担起重任，在促进地区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发展地方产业、带动经济升级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县域治理中需要考虑新经济业态的出现对于县域居民就业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幸福感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促使县域居民在“互联网+”时代平等地享受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

参考文献

- 阿里研究院, 2017, 《数字经济 2.0 报告》, <http://www.199it.com/archives/555294.html>。
- 滴滴、CBNData, 2016, 《2016 滴滴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 <http://www.199it.com/archives/556606.html>。
- 高小倩, 2016, 《“零工经济” 大行其道, 是市场发展需要还是人们的无奈之选?》, <https://36kr.com/p/5054508>。
-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 促进就业规划的通知》, 2017,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2/06/content_5165797.htm。
- 《共享经济时代的新型工作方式》, 2018, <http://epaper.hljnews.cn/hljrb/20180514/353382.html>。
- 金丹、刘婧, 2018, 《“互联网+零工经济” 就业模式探索》, 《河北企业》第 8 期, 第 52~54 页。
- 李珊, 2019, 《我国“互联网+零工经济” 的现状研究》, 《河北企业》第 5 期, 第 74~75 页。
- 秦艺瑗, 2018, 《浅谈“零工经济” 的现状与未来》, 《现代商业》第 32 期, 第 186~187 页。
- 《趋势 | 中国自由零工的生存状况分析报告》, 2017, http://www.sohu.com/a/141427926_577622。
- 吴清军、李贞, 2018, 《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关于网约车司机工作的混合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第 137~162 页。

- 向坤, 2019, 《零工经济, 一种完美的经济形态?》, <https://www.tisi.org/10824>。
- 谢富胜、吴越, 2019, 《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 《经济学家》第6期, 第5~14页。
-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 2018,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 <http://www.sic.gov.cn/News/79/8860.htm>。
- 杨滨伊、孟泉, 2020, 《多样选择与灵活的两面性: 零工经济研究中的争论与悖论》,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第3期, 第102~114页。
- 郑祁、杨伟国, 2019a, 《零工经济的研究视角——基于西方经典文献的述评》,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第1期, 第131~139页。
- 郑祁、杨伟国, 2019b, 《零工经济前沿研究述评》,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第5期, 第106~115页。
- 《“零工经济”时代或已到来》, 20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9728609182995579&wfr=spider&for=pc.2018>。
-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2015, http://www.gov.cn/xinwen/2015-05/01/content_2856034.htm。
- 《李克强在湖南考察》, 2018, http://www.gov.cn/premier/2018-06/12/content_5298167.htm。
- Aloisi, Antonio. 2016. “Commoditized Workers: Case Study Research on Labor Law Issues Arising from a Set of On-demand/Gig Economy Platform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37 (3), 620–653.
- Ashford, Susan J., Brianna B. Caza and Erin M. Reid. 2018. “From Surviving to Thriving in the Gig Economy: A Research Agenda for Individuals in the New World of Work.”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8 (2), 23–41.
- Byrne, Julie and Rowena A. Pecchenino. 2019. “Heigh Ho, Heigh Ho: Flexible Labor Contracts with Real Option Characteristics.” *Business Economics* 54 (1), 25–34.
- Farrell, Diana and Fiona Greig. 2016. “Paychecks, Paydays, and the Online Platform Economy: Big Data on Income Volatility.” *Proceedings. Annual Conference on Taxation and 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 109, 1–40.
- Friedman, Gerald C. 2014. “Workers without Employers: Shadow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the Gig Economy.” *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 2 (2), 171–188.
- Gleim, Mark R., Catherine M. Johnson and Stephanie Lawson. 2019. “Sharers and Sellers: A Multi-group Examination of Gig Economy Workers’ Percep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98, 142–152.
- Gupta, Neha, David Martin, Benjamin V. Hanrahan and Jacki O’Neill. 2014. “Turk-life in India.” *Proceedings of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pporting Group Work* 11, 1–11.
- Huws, Ursula, Neil H Spencer and Simon Joyce. 2016. *Crowd Work in Europe: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a Survey in the UK, Sweden, Germany, Austria and the Netherlands*. London: FEPS and Uni-Europa.

- Katz , Lawrence F. and Alan B. Krueger. 2019. "The Rise and Nature of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 1995 - 2015. " *ILR Review* 72 (2) , 382 - 416.
- Lepanjuuri , Katriina , Robert Wishart and Peter Cornick. 2018.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in the Gig Economy: Final Report*. London: BEIS.
- Li , Zirui , Yili Hong and Zhongju Zhang. 2018.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s on the US Labor Market. " *Proceedings of the 51st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84 , 666 - 674.
- Rozzi , Fabien. 2018. "The Impact of the Gig-economy on US Labor Markets: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Non-employer Firms Using Econometric Models and the Example of Uber. " *Junior Management Science* 3 (2) , 33 - 56.
- Stanford , Jim. 2017. "The Resurgence of Gig Work: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28 (3) , 382 - 401.
- Stefano , Valerio D. 2016. "The Rise of the 'Just-In-Time Workforce': On-Demand Work , Crowdfund and Labour Protection in the 'Gig-Economy' . " *Comparative Labor Law Journal* 37 (3) , 471 - 504.
- Taylor , Matthew , Greg Marsh , Diane Nicol and Paul Broadbent. 2017. *Good Work: The Taylor Review of Modern Working Practices*. London: Great Britain ,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